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主编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著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卷二：宗教思想

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杨德友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卷二：宗教思想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著;
杨德友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80-5380-6

I. 托… II. ①梅… ②杨…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
1910)-灵魂-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1821~1881)-灵魂-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921②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736 号

目 录

序 言	1
-----------	---

上 篇

第一章 托尔斯泰笔下的反基督	33
第二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反基督	97
第三章 托尔斯泰笔下的基督	171

下 篇

第四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督	217
第五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分裂	269
第六章 托尔斯泰笔下的最终分裂与最终合一	401
附录：梅列日科夫斯基作品编年	466
译者后记	468

序 言

坦率地说，一直到最近，托尔斯泰都从来不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十足意义上的“导师”。原因何在呢？——问题就是这样。

以无意识的创作力量，即我们所说的“天才”为一方，以意识、智慧的力量为另一方，在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应性、相互适合性，正如在人的体重、身高与其肌肉力量之间的关系那样。在普希金、歌德身上，可以看到这种高度的相应性。他们的精神建构类似于最优美人体的建构：身体各部分和四肢都令人艳羡地互相适应，比例恰当，因此，他们的活动轻快自如。他们能完美地控制身体各部分，行动轻便自在，行走“如飞”。这种相应性，托尔斯泰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仅仅是水平很低的。对于自己的天才而言，他不够智慧，或者，对于他的智慧而言，他的天才又过分了。能够轻易支撑中等身材之人的肌肉力量，对于巨人而言，就可能显得不够：爱发议论的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虚弱的巨人；是歌利亚，小大卫迟早会用投石器中的石块杀死他。

托尔斯泰这种缺乏快速、轻易运动能力的状况，智慧的这种不易转动的沉重性、笨重性，像他其他没有被他人发现的许多特点一样，是首先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托尔斯泰“虽然享有巨大的艺术天才，却属于这样的一类俄罗斯智士：他们只能看清楚眼睛正前方的东西，因而便死死扼住这一个点。把脖子向右或向左转一下，看看立在侧面的东西，他们显然是办不到的：为此，他们必须转动整个躯体，从头到脚。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

大概才能说出完全相反的话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永远是严格地真诚的”。后来，他称这种直线心理为“痴狂”（1877年《作家日记》）。在另外一个场合下，关于不仅为托尔斯泰，而且也为一般的俄罗斯心智所特有的把一切过度简单化、“粗线条化”的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说：“简单化是直线性的，而且是傲慢的。简单化是分析的仇敌。分析往往在您因为简单化而开始不理解事物对象之时告终；您甚至完全看不到对象，就已经发生了逆反的过程，亦即，您的目光自动地、不由自主地从简单过渡到了奇幻。”

在托尔斯泰证明“经验的知识一文不值”（文集，1898，XV，第230页）之时；在他断言从牛顿到赫尔姆霍兹的近代科学的全部发现——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对原生质、原子形式的研究，对恒星的光谱分析”全是彻底的“雕虫小技”（XV，224）之时；在他口出下列言论之时：和“关于人民福利”、“用什么斧子砍树更好”、“哪些蘑菇可以吃”（XII，175）的真实科学相比，上述的科学全是“完全无用的鸡毛蒜皮”（XII，193），“给人民的废料”（XII，181）；“我们全部的科学、艺术——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肥皂泡罢了”（VI，264）；“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科学的水平都从来不像今天那样低下”（XV，256）；科学就像犹太教律法一样，为研究这本书现代人“绞尽了脑汁”（XII，168）；——在托尔斯泰作出这一切断言之时，他恰恰是“死死抠住一点”，因为不会“向右或向左”转动一下脖子。这一切当中当然包含着简单化和直线性，但这简单化是“奇幻的”，直线性是“痴狂的”。在听完关于科学的这些狂言之后，莎士比亚变成“俗不可耐的才子”（《雷文费尔德论托尔斯泰》，113），这样就不再可能令任何人吓了一跳了；农民小儿费季卡在自己的写作中不仅超过了托尔斯泰，也超过了歌德（IV，205）；薄伽丘的作品中“除了乱描乱画下流性行为之外”一无所有（XV，89）；拿破仑是个小傻瓜，古代希腊人是“半野蛮奴隶主阶级蕞尔小民，长于描绘一丝不挂之人体，建造悦目之房屋”，“但是道德水平不高”；一切的女人裸体，连维纳斯在内，都“不堪入目”（XV，

192)；全部“描绘女人裸体的绘画、雕塑都是形形色色丑陋不堪之物”（此话并不字字准确，但是我并没有夸大，请参见原文：XV，205），一切“只有一个明确目标——尽可能广泛传播淫乱的现存艺术”，都应该“消灭干净”，——“最好什么艺术也不要”（XV，206），因为，最后，应该在某一个时候摆脱将会淹没我们的“这淫荡的、令人误入歧途之艺术的混浊泥流”（XV，211）。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一般都是相当宽容的，对一切都容易习惯——在四十多年间已经听惯了托尔斯泰这种评论，已经善于泰然处之。只有他那些过分天真和自控力差的手，才依然争论、发火；而其他的人则早已明白，争论有没有托尔斯泰所说的“制造愚昧最强有力之武器”（Ⅷ，第二部，第150页）的图书出版业，是否可以把贝多芬的音乐拿来和农村老大娘的小曲儿比较，是没有益处的。

看来，生气最少的，恰恰是受托尔斯泰否定一切式攻击的那些人：大家强烈地觉得，他虽然否定文化世界的全部基础——科学、艺术、财产、国家、教会，而且凭着这样的“狂放的直线”精神，似乎世界就要毁灭——但是，这种否定的全部力量依然绕过了生活，远离了生活。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由于十八世纪勇猛程度低得多的自由思想而爆发，那么，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中是什么革命也出现不了的；一切都在他那里以佛教的“无为”、“不反抗”告终，是有其道理的：吼得凶，睡得稳。震耳欲聋的空弹射击——好大的苍蝇拍子。

托尔斯泰式的一个十分年轻又诚恳的人物说：

我大大地恼怒了，原因就在于那种沸腾的愤懑之怒火，我喜欢把这怒火藏在心里，甚至还刺激它，只要它挑拨起我来；因为这种怒火对我起一种安抚的作用，在短时间内给予我全部身体和精神潜能的某种不同寻常的弹性、力能和力量。

这位少年人物像让-雅克·卢梭一样，天真之极，同时又怀有

托尔斯泰式无政府主义的造反精神。

我想，如果招待员和门童（这里谈的是在国外一家旅馆里）不是那么彬彬有礼的话，我就会高高兴兴地跟他们搏斗一番，或者用棍子打毫无还手之力的英国小姐一顿。这时候我如果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话，我会高高兴兴地扑进英国人的战壕，把他们赶尽杀绝。

不久以前，因为有人对他近期的一篇文章作出强烈反驳，七十岁的托尔斯泰直率而诚恳地承认：“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满足。你感觉到，正好踩在一群蚂蚁中间，于是它们大发雷霆，乱跑乱窜。”不过，有时候他自己也回过味来，“死死盯住一个点”盯得累了，最后，“便用整个身躯、整个身体”转过来，突然发现面前不是原来设想的人们的满脸怒火，而是善意的微笑，于是便以甚为感人的坦率承认：“他们都觉得难为情，好像用目光告诉我：因为出自对你的尊敬，我们才擦去了你的愚蠢，可是你又凭那股蠢劲儿乱窜！”（XII，60）是啊，在这位伟大的老人能够成为永恒赤子之能力中，有某种令人极为感动的东西：就其无意识的睿智、就其对无理性生命的秘密之最为深刻的观察而言，他似乎不是七十岁，而是已经七百岁；就其聪明、就其意识而言——才十七岁，或者甚至七岁；似乎时至今日他仍然是那个列乌什卡（托尔斯泰名为列夫，此为爱称）；他想飞翔，于是从教室窗口跳了出去，几乎摔断了脖子。

于是，一切都蓦地骤变：游戏变成了悲剧性的；他的夙愿得以实现：他是先知和导师，即使不是全体俄罗斯人民的，至少也是文化界的。

情况是这样的：俄罗斯有教养的人士在托尔斯泰的旗帜下联合了起来，以思想自由和良知的名义反抗僵死的教条和经院哲学，但是，似乎表现在圣宗教会议的、被一切人所接受的定义中的黑暗与愚昧精神，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地“证实

堕落”，而是为了真正地，虽然是隐蔽地“脱离教会”，为了一种特殊的“革除教籍”。

为了使这一事态证明是不受怀疑、是确实的，必须遵守一个条件：师生在理解为什么在共同旗帜下联合起来方面思想见解必须一致，也就是说这是对真正的教育的理解。按照《托尔斯泰答圣宗教会议》中的一条的确是模棱两可的提示，似乎可以认为，类似的思想现在就存在，而且，以往是一直存在的。托尔斯泰说：“圣宗教会议的决定是武断的，因为它只谴责我不相信决议中列举的要点，但是，实际上不仅很多，而且几乎全部受过教育的人都持有（应该理解为：与我共同持有）同样不相信的态度，而且在谈话中，在阅读中，在手册中，在著作中过去和现在都在不停地表现出这一态度。”（《托尔斯泰答圣宗教会议》，《自由言论报》，第22期，第2页）为了让这几句话在我们眼里产生精诚所至的重大力量，或者是我们必须完全忘记托尔斯泰全部四十年的文学活动和说教，或者是他自己必须放弃全部这些活动的主旨。因为我们知道，直到现在，对于他来说，我们全部的教养、科学、艺术，都仅仅是“肥皂泡”、“没人需要的雕虫小技”，而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科学和艺术的卫士”本身，在他看来永远都是“下三烂的骗子，比那些最最滑头和淫荡的术士所可能支配、享有的权利要少得多”（Ⅺ，198）。果真如此的话——而托尔斯泰是不否认这一点的——那么他为什么不讨厌他们，却要和我们联合起来去反对教会，和一些骗子一起去反对另外一些骗子呢？在托尔斯泰思想总体脉络上，对于作为基督教文化——历史形态的东正教的否定，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否定，只是他对全部现代欧洲文化否定性结论整条链条上的一环；在这里，教会不是作为外在于文化并与其对立之物，而正是作为这一虚伪文化的组成部分遭到反对的；这一虚伪文化的其他部分是科学、艺术、财产、国家。

俄罗斯文化界如果一去不返地和反对文化本质的人联合起来，不是要面临脱离自身本质、脱离自己生存权利的危险吗？

人们只可以以某种肯定、某种确认而结成牢固的、内在的同盟，但是，以某种否定、没有任何肯定而结成的同盟——永远是外在的、权宜的、临时性的：从一物皆无中一物也产生不出。从某种共同的确认中可产生共同的否定，但是，从否定中不可能产生共同的确认。人们如果喜爱一事，就会憎恨一事；但是，如果喜爱各种事，就可能也憎恨各种事，虽然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只憎恨一件事。在俄罗斯人和托尔斯泰的同盟中，只有共同的否定——否认正教，而没有任何的肯定——对基督教新形态的肯定；这是在没有肯定的一致见解情况下的、否定的联合。因此，连这个同盟本身，也只是外在的、权宜的和临时性的，与其说是同盟，不如说是聚会。似乎连托尔斯泰自己也意识到，至少是感觉到了这一点，甚至似乎泄露出了这一点。在《答圣宗教会议》中，有一句话真诚至极，在这句话里突然又出现了全部以往的、真正的托尔斯泰，又可“从爪子”辨认出“狮子”、那伟大的异教徒、叶罗什卡叔叔来：“我要独自一个人生生活，独自一个人死去。”（第11页）越思量这句话，这句话就越难以置信。他是基督徒，至少自认为是“基督徒”，对于他而言，基督教的本质就是爱人：爱人就意味着生、死和人们在一起——为他们而生、而死。而在这里却表明，他不需要这样；他不必和人们一起生活，而是“独自”——“独自一个人活着，独自一个人死去”。“你是王；一人活着”——他完成了这一遗嘱。他过去是一个人活着，也将会独自死去；“这个人从来没爱过任何人”，所以也没有人爱他。不是对人的爱，不是与人联合，而是独处，“强力与孤独”，这就是他的生活的真正含义。要知道，他为这一表白所选择的时刻是不可能更不恰当的：因为在现在，包围着他的荣耀和人们对他的爱是他以往没有享受过的，不仅俄罗斯，而且全世界的受过教育的人都拥挤在他周围，像小学生团团围住教师，像羊群团团围住牧人——偏偏在现在他突然感觉到，他是独自一人，他想要独处。啊，这已经不是游戏、不是佯装，这是他全部生命的终极真实，对己对人的终极严酷，是他真正的伟大之处。他知道，全部的爱，世人的赞誉，

都只是欺瞒与幻影；他知道，谁也不爱他本人，没有人关心他本人、他真正的生与死、他永恒的拯救或者永恒的堕落、他的基督教或者非基督教、或者总体基督教——谁也不关心任何事与任何人，谁也不喜欢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和任何别人一起喜欢单一的东西。在共同的空虚与孤独中，在托尔斯泰对教会的反抗中，在恍惚之中，我们眼前出现了某种被忘记的、遥远的东西，某种交谊的幻影，某种影子的影子——而我们则趋之若鹜，追赶这个影子；但是，这影子很快消散，因为，从虚无中什么也产生不出来；从总体的否定中产生不出来总体的肯定——因而，我们依然留在大的空虚、大的孤独之中。这里没有真正的否定，没有真正的肯定，没有信仰，没有无信仰，——只有狡黠的冷漠、无精打采的摇摆，不稳定，放肆，可怕的全欧保守——自由中间派，既非驴，又非马，或者，有更可怕的、俄罗斯的“唾弃一切”——俄罗斯虚无主义。正是在这里，并非在七十年代的虚无主义中，而是在我们当今的托尔斯泰式的虚无主义中，正在完成一种伟大的分裂，即俄国文化界脱离人民。始于彼得大帝改革的俄罗斯文化的历史道路已经走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不可能再往前走，也无处可走；路已经没有，路已走尽”，“在这里，彼得大帝的改革终于走到自己最后的界限”，走向自我否定。俄罗斯文化界，因为追随托尔斯泰反对作为俄罗斯和世界文化组成部分的教会，而且追随到底，就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否定自己俄罗斯的和文化的本质；这一文化界如果置身俄罗斯和欧洲之外，就会反对俄罗斯人民和欧洲文化；如果不是俄罗斯的和文化的，那就什么也不是。在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中，彼得大帝以后的全部俄罗斯，从文化上看，还是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是站在某种终点上，在深渊的上方摇摆”。这个俄罗斯以为它是在为了自己的拯救才和教会，亦即和历史、和人民作斗争的——实际上，它是在为自己的死亡而斗争：这是可怕的斗争，就像自杀的人和阻拦他对自己下手的人搏斗一样。

最可怕的是，这场斗争进行得无声无息，在寂静中发展。教会

已发表见解，托尔斯泰也发表了见解。但是，两个主要的对手——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文化界，却都保持沉默。人民保持沉默，一贯如此；文化界的沉默含有特殊意义：这是一种特殊的“沉默之密谋”。不能说赞成托尔斯泰的话，也不能说反对他的话，甚至不能谈论他。只好沉默。但是，“沉默之时，即高呼之日。”在俄罗斯，情况总是这样：总要形成比第一种审查更活跃、更严厉的第二种审查——“社会舆论”的审查，这是对于第一种审查的完全准确的、虽然是像在镜子中那样返回式的反映。俄罗斯思想就出现在像两个火堆一样的两种审查之间——而托尔斯泰就正好给关在一个怪圈里。现在，在俄罗斯，人们提及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的时候，就等于提及上吊者所在房屋中的绳子。

最后证明，虽然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但是，在这种疑症中，最有顺势疗法特征的比例，就是最强有力的），面对“几乎全部”有教养的俄罗斯人，不赞成托尔斯泰就意味着反对他。处境不仅毫无出路，而且也毫无意义，像在梦幻中一样：四面八方来的是怪异幽灵，必须逃避、自救，可是腿动不了，一步也迈不出去。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是不能谈论的，但是也不能保持沉默。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有权利像他一样，当然，是在另一层、更谦卑的意义上说：

我要独自一个人生活，独自一个人死去；我的信仰是否引诱了谁、妨碍了谁，我是没办法改变的，我不能换一个与我现在信仰不同的信仰方式，因为我准备走向我的上帝，即我从他那里出发的上帝。

如果存在着某种东西，面对着它我的生与死都具有像托尔斯泰的生与死所具有的永恒意义，那我是不能够沉默的。

我有两个主要的问题，两项疑问。眼下这些文字将充当一本书的序言——这本书全书仅仅是凭借生动的、对于我们而言最亲近最

明显的例证，论证这些问题之一的经验——这是关于基督神圣性对立两极——灵之神圣与肉之神圣之可能合一的抽象而神秘的问题。我意识到了我的陈述中全部的缺点、支吾、语焉不详，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予以修正和讲解：这会把我拉得太远，因为，就是想要明晰、精确地提出类似的问题本身之作法，都是一件不仅超出我的，而且，一般来说，是超出一个人的任何力量的劳作：这里需要的是整整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工作。在这里，我只是要简要地重复我的立论、正题，并提出一项总体依据；而我立论的要旨，也还是希望从这部著作本身十分鲜明地展现出来。

历史上的基督教强化了神圣性之两个神秘之极之一，而损害了之二——强化负极而损害正极——强化灵之神圣而有损肉之神圣；灵被理解为并非是肉的对立一极，所以是肯定性的，而被理解为完全否定肉的、没有实体性之物。非实体对于历史上的基督教就是灵的，同时也是“净洁的”、“善的”、“神圣的”、“神性的”，而肉的则是“不洁的”、“恶的”、“罪恶的”、“恶魔般的”。这样就形成了无限的二分法，肉与灵之间没有出路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导致前基督教世界的消亡），区别仅仅在于：在那里，在异教中，宗教企图通过肯定肉、损害灵来走出这一矛盾，而在这里，在基督教里，正好相反，要肯定灵而损害肉。

既然如此，我就要问：按基督的教导，禁欲主义，对肉的压制，仅仅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不就在于对肉的净洁、照亮和最后的复活吗？历史上的基督教难道没有用手段取代目的，而且程度无以复加，最后，手段变成了惟一的、包拢一切的、自满自足的目的了吗？肉的复活被推向不可企及的、神秘的远方，这远方与基督教的真实的、尘世间的、历史的和有机的实在几乎毫无联系。肉的复活、肉的神圣是被抽象地、教条地、冷漠地、凝滞地接受的；而压制却接受得确实、活生生地、火热地，以致到最后压制完全凌驾于复活之上。历史的基督教似乎在对肉的压制和复活之间划了等号。在基督的义理里是没有这个等号的：在那里，对肉的低下状态的否定，因为只

和对肉的最高状态的肯定联合为一，所以，是一条通向复活之道路： $a \times b = c$ 。在历史的基督教中， $a = c$ ；压制即复活，死即生，生即死；死为死，生亦为死——除死之外，别无其他。对生的否定即不死；对肉的否定即灵；为否定而否定；只有单纯的否定，毫无肯定。在基督的义理中有辩证的发展：正题是肉，反题是灵，综合是“有灵之肉”，与此不同的是，在历史的基督教中得到的只是僵死的逻辑同一：无肉的神圣取代神圣的肉，无肉的灵性取代有灵之肉。在基督义理中，生活的全部彩虹在达到最高级光明之时，化为单一的复活的白光，亦即对肉与灵的最高级肯定；而在历史基督教中，这些彩虹逐渐变弱、熄灭，最后完全消灭在死亡、损害、对肉与灵的最终否定等的单一黑色之中：斋戒、悲哀、痛苦、恐怖——这就是逐渐浓重起来的阴影，这些阴影正在汇聚成为历史基督教的一种确确实实的修道制的颜色。整个古代绚烂多彩、多语言的世界，及其科学、艺术、社会形态、智慧的全部宝库——全部的“异教”，如果说没有找到，那也还是绝非徒劳地寻找过“神圣的肉体”的——全部“异教”虽然都被历史的基督教自发地、无意识地接受、吸收，却又被基督教意识、推理、逻辑各视为“沉沦于恶的世界”——过于光明、过于“世俗”而推翻。因此，在基督教里，人类似乎自己起来反对自己，至少是有意识地在自己已经成就的最高宗教珍宝的整整一半之中否定了自己。不仅在每一个个人，而且在全人类的生活之中，都发生了无尽的两分现象，没有出路的、悲剧性的矛盾。

这样，我的问题又来了：在基督义理中没有指出这一矛盾的出路吗？在此世两极对立情况中，这一义理没有肯定灵与肉在彼岸的神秘的合一吗？换句话说，基督没有肯定灵与肉的同等价值、同等神圣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则灵即“肉”——另一样的、改变了的、更高级的，但依然是“肉”，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灵是肉之肉，是肉中的最坚实、最不朽、最真实，同时又最神秘者，是全部的肉所借以巩固和维持者。灵不仅是对肉的低级状态的否定，也是对其高级状态的肯定；灵是肉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从光明

向光明”，向变容、复活之最后白光的不间断的运动，因为在复活中生命的各种不同颜色的彩虹将化合为一。灵并非无肉体的神圣，而是神圣的肉体。实际上，基督的义理，即使没有彻底展示（“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却也相当清晰地指出了圣灵和圣体在生存三个主要完整时刻中走向这一合一的三条途径：在开始的时刻，是通过诞生的秘密，即显现——“道成肉身”的秘密；在延续的时刻，通过圣餐式、肉与血的奥秘；在终结时刻，通过肉体复活的奥秘。在存在的全部这三个时刻，指出的不是非肉体的神圣性，而是神圣的肉体。历史的基督教没有推翻这三条隐秘的途径，但是也没有沿着三条路走，至少没有生动地、确实地沿着走；历史的基督教在这三条途径面前止步，封闭在抽象的教条、没有行动的圣礼之中；关于神圣肉体全部这三个奥秘都还依然是奥秘，亦即没有展现的真理，而圣礼的全部含义就在于展现尚未展现的真理，将圣礼变为天启。“我的言你们担当不了。”最少地置入我们心中的正是他关于神圣肉体的这句话，我们听而不闻；还说：肉体神圣，但是从未将其变为神圣，而过去和现在做的，都好像是肉体永远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神圣的，似乎那“无肉”的就是属圣的，而“肉体的”则是无灵的。在言语上我们接受和赞颂，在行动上我们则诅咒、惧怕、痛恨、损害、不去复活肉体，并以它为耻。欧洲人全部现实的、活生生的肉体——他们全部的文化、艺术、科学、社会结构——都依然是不神圣的，或者，非基督教的。肉体从来没有比在我们现在经历的历史基督教这一时刻里更为罪恶、粗野、没有灵魂。甚至在异教中，肉体也是更现实地神圣、光明、“有灵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从拉斐尔到歌德的一切人，即那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寻找神圣肉体的人，都从基督教滑进了异教。

在这一切之中，我所看到的不是基督教的某种偶然的，或者命定的、不可改正的错误、“失利”，而仅仅是它发展的历史的（正因为仅仅是历史的，所以绝对不是神秘主义的）必然性；为了成长为独立的和可等同于希腊—罗马异教的现象，基督教必须首先以全部

可用的力量来脱离异教，正像起航的船只要离开海岸一样，而且要把自己和异教对立到最后可能的极端；在单方面的吞噬一切的禁欲主义、损害肉体、无实体神圣性等的理想中，它也找到了脱离、否定、抛弃异教的这种必需的力量。“如果你不死，就不会再生。”人类已经“死了”几乎两千年了，为的是“再生”。理应如此，岂有他哉。主已预见到这一点：“不因我而受诱惑的人有福了。”禁欲主义之最伟大的“试探”，当然，也见于基督的真正义理，但这是“拯救”中的试探。禁欲主义是一把刀，它以流血、以生命危险把基督教和异教分开、割开，好像把新生儿从母亲的脐带上割开一样。

现在，人类遇到的情况类似于被抛入宇宙空间，从地球飞向某一天体，如月球，这样的物体的情况：这飞行的物体达到了地球引力结束的一点，当然排斥力就变得没有必要了，甚至这种力量会直接阻挡飞行，因为在这里已经开始有月球引力的反向力量。在我们所感受到的基督教的时刻，人类也正好达到了这样一个点：即自己的开端与终结、第一次与第二次降临之间、在宇宙空间的一点；这个点是令人畏惧的，因为显得是死点：包含在第一次来临中脱离、否定、排斥异教的力量几乎已经结束，而包含在第二次来临中反向的吸引力几乎还没有开始。于是我们觉得，运动完全终止了，我们已经永远地滞留在这中间的死点上，基督教的全部力量已经不再影响我们，而且，一般来说，“也影响不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力量的计算是由数学的精确性完成，并且由永远不犯错误者完成，在飞行一瞬间，反向吸引力已开始，而且在不停地、无限地增长的行进过程中将要加大，我们身上和我们周围的一切突然要发生变化，一切都将取得相反的状态：上方变作下方，下方变作上方，我们突然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在飞翔，而是以令人惊骇的速度下降。否定、死亡、损害终结；肯定、复苏、复活开始。基督教从主的第一个——悲哀的、阴暗的、奥秘的——面目，转向第二个——高兴的、光明的、荣耀的——面目。这个最伟大的宇宙性的转变，今天正在完成，几乎不可目击，不可感觉，正像同类的宇宙性巨变发生

之际那样。

按照果戈理的比较，西派的、罗马天主教会就是“活跃的马大”：她完成了必不可少的行为——脱离异教，最终地巩固、构建了作为一个特殊的、惟一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历史整体的基督教。它的妹妹，东部教会，迄今似乎一直处于一切作为之外：像静观的玛利亚一样，她生在主的脚下，一言不发地听着主的话。现在是不是也该轮到她了？她难道不会应召去完成某种伟大的业绩，而在这业绩中则加入了没有被任何人担当的主关于圣灵和圣体的话：“真理的灵必要到来，它要引导你们走向一切真理。”真理之灵，圣灵，难道不引导我们走向关于圣肉体的任何真理吗？不是西派的、也不是东派的教会，而是普世的、未来的教会，从其最终的、尚未展示的使命来看，不正是圣肉体与圣灵的教会吗？

无论如何，关于圣灵对圣肉体关系的问题，虽然仅仅显得是静观的神秘论问题，现在却已经具有巨大的生命的、真实的意义，这一点可见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是席卷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场疾病的许多症状之一，这是无实体之灵的疾病，它仅仅是没有灵魂之肉体的面具，是仅仅作为唯物主义面具的唯灵论的疾病。

托尔斯泰是为了什么反对教会呢？为了无实体的灵——反对灵和肉。他否定包含在基督教圣礼和教义中有关圣体的三个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圣餐礼的奥秘、肉体复活的奥秘。他之所以反对这三者，是因为认定这三者是耸人听闻的宗教唯物主义，“妖术”、“魔法”，“对肉体的”亵渎神明式的“神化”，这一切，他在《答圣宗教会议》中已高度明确地表述了。他反对教会，是因为反对肉体，他不愿意要任何的肉体，蔑视一切肉体，视其为某种粗野、罪恶、肮脏、僵死、没灵魂的东西，他不相信圣体，只相信没有实体的神圣。上帝是灵——这一点他理解，从全部历史的基督教中，他仅仅就理解了这一点；然而，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似乎比历史的基督教本身更具历史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是的，无论这显得有多么奇